

# 门诊输液严控已成各大医院“新常态” 叫停门诊输液需医患形成共识



□本报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郑轲

昨天起，市第一医院叫停门诊输液。此前的15个月，市第二医院已悄然加强门诊输液管控，于去年11月起前全面叫停门诊输液。

门诊输液严格管控，已成为甬城各大医院的一种新常态。从“吊瓶林立”到“吊瓶林立”的主力军是谁？门诊输液严控难在哪？昨天，笔者走访了甬城各大医院。

## 各大医院输液患者大幅下降

昨天上午9时半，笔者来到市第一医院门诊急诊输液室。过去人满为患的输液室，现在显得异常冷清。输液室面积比过去小了一半多，输液椅从过去的98张减到现在的45张。“就这45张椅子也只坐了三分之一。”输液室护士长任松静说，开张2小时里只接待了41名输液者，其中抗生素输液的只有一位，即27岁的急性扁桃体炎患者，拿着门诊输液联系单、转诊单，有门诊医生和急诊医生双双审核签字过来的。

## 电工助力 稻谷归仓

昨天，鄞州区供电公司古林电管站党员服务队电工正在古林稻谷烘干中心排除输送带电机故障。目前，正是晚稻抢收高峰，该队供电公司组织多支电力服务队奔赴田间地头，为粮农做好用电保障，力保稻谷颗粒归仓。

一位护士告诉记者，没限制门诊输液时，最忙一天要接待600多号输液患者，连上厕所的功夫也没有。上个月，每天接待百来号输液患者，工作量明显下降。一部分病人被叫停输液，一部分病人改为肌肉注射。

上午11时半，笔者来到市第二医院7号楼门诊急诊输液室，只见输液室面积是原来的三分之一，近60把输液椅只坐了不到30位输液者。该院主管医务的院长助理毛月存说，该院早在去年9月叫停了中成药物门诊输液，随即关停了2号、3号楼的门诊输液室，把7号楼的门诊输液室并入急诊，随后在去年11月17日全面叫停门诊输液。

“门诊输液量从管控前最高的大约800人次/天，下降到每日门诊新增输液20至30人次。换言之，门诊输液占门诊病人比例从过去的千分之144下降至千分之五以内。”毛月存说，同时因输液产生的不良反应比例也直线下降。

## 抗菌药物分级使用，责任到每位医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称，以往的“吊瓶林立”有深层次原因。一是观念问题，只知道输液“好得快”，输液的种种危害与隐患被人漠视，甚至很多医生也对此认识模糊。七八年前，“三素一汤”（抗生素、维生素、营养液和大输液）被乡镇卫生院作为当家治疗手段普遍使用就是一个明证。二是输液门槛太低，各

级医院里大小医生均可开处方，也没有明确的指征限定。此外，上世纪80年代末起的药品加成销售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门诊输液的泛滥。

据宁波市药物不良反应监测表明，近10多年来，在药物不良反应中，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占比有五至六成。有位医院院长痛惜地说，30多年前用青霉素能控制的，现在必须用第三代或第四代抗菌药物，产生耐药反应的人群越来越大。数年前，大小医院药品零差价销售，这一医改新政的推行，也切断了隐形的利益链。这些因素客观上助推了宁波各家医院严控抗菌药物在临床的使用。

严控抗菌药物的使用已逐渐成为宁波各家医院的共识。据了解，市级医院抗菌药物占药品消耗比基本低于23%。各家医院将抗菌药物的使用层层分解到各科室，责任到人，使每位医生对自身执行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落实到每个医疗环节。早在四年前，市级医院抗生素品种减少至50种以内，分非限制使用、限制使用和特殊使用三级管理。市妇儿医院夜间输液也要排长队，曾是抗菌药物输液的“重灾区”，现在在输液量不足五年前的一半，输液室也由过去的4间缩至2间。

## 叫停门诊输液需医患形成共识

给药的方式主要有外用、口服、肌注和静脉输液等。但从安全性来说，静脉输液的风险最高。“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

不输液”是世卫组织提出的给药原则，也是目前我国卫计委所确定的合理用药原则。

哪些人群是门诊输液的“主力军”？在昨天的调查中，笔者发现按病种分：呼吸道感染、腹泻是主力；按人群分：老人和学龄前后的儿童居多，老人输中成药居多，儿童输抗生素占大头；按医院科室分：呼吸科、皮肤科包括性病门诊、泌尿科是当仁不让的主力。

市第一医院院办主任赵冠青说，该院早在3年前就采取管控措施打算逐步取消门诊输液，记得当时媒体报道后，市民反响强烈，不少人认为太激进。而今，通过数年的门诊医生主动引导，合理用药的观念正在病患中逐步形成。

昨天在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医生林秉贤诊室里，笔者看到2小时里接诊20多位病人，只有2位病人因慢性湿疹反复发作，希望打针见效快些，其余的均听从医生的口服给药。“其实，疗效是跟药物的性质、质量有关，与能达到的血药浓度相关，与给药途径真没相关联系。”林医生一遍遍地解释后，那两位病人接受口服与外用给药。



## 一把儿童安全座椅占有了20%欧洲市场——“我们还把设计卖给了国际大牌”

“总理问笔”引出话题 供给侧改革的宁波诉求③

□本报记者 梅子满

12月1日，Mama&Bebe在鄞州印象城开出它在宁波的第4家儿童安全座椅专卖店。

成立短短6年，Mama&Bebe品牌拥有者、位于奉化西坞的宁波市博林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画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成长轨迹——它不仅占有了欧洲20%的市场，还成为诸多国际一线品牌的产品设计方案提供者。

“定位决定品质，我们一开始就定位为高端儿童安全座椅生产商。”公司销售总经理潘彦呈告诉记者，宁波是“中国儿童安全座椅之都”，早在20多年前就有企业涉足这个领域，目前有相关企业30余家。不过，博林在成立之前做的一次市场调研却让潘彦呈“很痛心”：多数企业不是在为国际大牌做代工，就是在生产低端产品，基本没有品牌意识。“如果我们还继续走老路，做低附加值的产品，那‘中国制造’还会有未来吗？”

高起点的定位，带来的是对品质的极度讲究。博林的所有产品通过全球最严格的儿童用品安全测试——荷兰TNO测试，并成为中国首批全系列通过国家3C认证的企业之一。除了安全性能，舒适的人性化设计也是博林制胜的秘籍。在宁波环球城银泰Mama&Bebe专卖店，潘彦呈指着一款儿童安全座椅向记者介绍，该款产品刚刚在德国科隆国际婴幼儿及少年儿童用品展上获评年度最受消费者喜欢奖。“这是国内首款采用ISOFIX硬接口连接、太空防撞棉的儿童安全座椅，而且女性也能单手操作。”

支撑高品质的，是高投入的研发。潘彦呈介绍，博林每年都会拿出

不少于年销售额20%的费用用于研发，今年已超2000万元。公司拥有了一支60余人的研发团队，并在荷兰、西班牙设立了研发中心，借用“外脑”保证品质。

如今，在欧洲，Mama&Bebe的产品成功进入了德国一线品牌“Concord”，英国的著名婴童品牌“Mama&papas”，西班牙最大的“JANE”，意大利奢侈品牌“FOPPAPEDRET-TI”。参加国际性展会，Mama&Bebe展厅里，来寻求合作的客人经常排满了队。2014年，Mama&Bebe决定开拓国内市场，结果当年销售额就超过了3000万元。目前，Mama&Bebe已经在全国拥有了300多个销售网点。

比赢得市场更让博林自豪的，是它有能力引领全球儿童安全座椅的潮流。“现在国际一线品牌，都在买我们的设计！”据悉，包括“Concord”、“Mama&papas”等在内的国际著名儿童安全座椅品牌，其设计方案都是直接来自博林。“儿童安全座椅生产最核心的环节是模具设计。”博林总经理林立告诉记者，博林在这方面一直有个做法，就是技术储备起码要领先两年，“当很多同行在模仿我们的设计时，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我们两年前的设计了！”

## 记者手记

博林的茁壮成长，得益于其不甘为国际大牌做代工、不甘低端产品的勇气和另辟蹊径、高位起步的前瞻眼光。“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企业定位一旦确定，其所有环节、资源匹配也将围绕此目标而运作，产品的品质也烙下了印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创新。具体到企业身上，关键是要有敢闯敢冒争一流的志向，敢为人先“吃螃蟹”的勇气和前瞻性的创新眼光！唯其如此，宁波制造才能“弹好钢琴”，在供给侧改革中寻到先机！

## 2016年赴澳汉语志愿者即将开始报名 符合条件者可申请攻读博士

本报记者 陈敏

宁波市教育局获悉，2016年赴澳汉语志愿者报名时间定于本月9日-12日。与往年不同，这次招收赴澳汉语志愿者不仅人数多了，资助标准提高了，符合条件者还可申请攻读西悉尼大学教育博士项目。

赴澳汉语志愿者项目始于2007年。宁波市教育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以及西悉尼大学三方签订协议，决定每年选派10名优秀的宁波汉语志愿者赴澳大利亚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推广。截至目前已经连续选派了8批59人次赴澳开展中文教学，在澳大利亚受益学生有10000余人，被澳大利亚当地誉为“小玫瑰”项目。2014年，宁波赴澳汉语志愿者项目被成功列入国家汉办国际汉语志愿者体系。

经宁波市教育局与澳方的协商，2016年将扩大派出志愿者的人数，择优选拔10-15名汉语志愿者赴澳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推广，并在未来几年根据实际情况逐年增长。

2016年开始，赴澳汉语志愿者的除了可以申请攻读硕士项目，符合

条件的志愿者还可以申请攻读西悉尼大学教育博士项目，学制为三年。学习期间，宁波市教育局将为博士生提供每年10000澳元的补贴，新南威尔士州接受志愿者学校提供每年3000澳元的补贴，西悉尼大学三年共提供14000澳元的补贴以及超过2000澳元的研究经费。

为了积极推进赴澳汉语志愿者项目的发展，2016年西悉尼大学将为人选的最优秀1名博士生和1名硕士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免学费），其原有补助额度不变。根据2015年资助标准，国家汉办和宁波市教育局每年为志愿者提供10000澳元的资助，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接受志愿者学校提供每年3000澳元的资助，西悉尼大学每年一半提供7000澳元的资助和2000澳元的研究经费。

目前，市教育局正在积极与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和西悉尼大学协商创新赴澳汉语志愿者的模式，并进一步扩大志愿者选择的专业。此外，还在积极洽谈“汉语教学+访问学者”项目。以上项目有望在2017年推出。

此次报名地点在宁波市教育局，联系电话：89186382，89186398。

## 人民币被纳入SDR引出14年前往事 宁波法官用国际视野作出368万“天价”人身赔偿判决

本报讯（记者董小军）北京时间12月1日凌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被正式纳入SDR（特别提款权的英文缩写），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其实，早在14年前，宁海事法院就在一起涉外海上人身损害赔偿案中，行使中国司法权，引用SDR标准，判决国外被告向中国受害者赔偿人民币368万元，这一数额为当时国内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约20倍，也大大超过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最高限额为每人80万元的标准。

此案发生于1999年，宁波港务局一位引航员登上巴拿马籍货轮“春天商人”号执行任务，由于船上软管突然断裂而

摔落，导致终身截瘫。此后，他向宁波海事法院起诉，要求“春天商人”号船东、巴拿马古德吉尔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赔偿759万元。经过审理，宁波海事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差旅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人民币3685581.53元。2001年11月30日，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被告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这是当时国内在自然人受伤索赔诉讼中，实际获得赔偿金额最大的案例。

那么，海事法院当时究竟根据什么，作出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判决的呢。该案主审法官、现任宁波海事法院执行局局长郭先江昨天回忆旧案，作了详细解释。当时，法院经过核算，按照涉外索赔的标准，确认原告因治疗而

发生的医疗费、残疾用具费、护理费、营养费、差旅费等为29万余元人民币，继续治疗费为168万余元，出院后的护理费24万元，因残疾不能继续工作的收入损失为136万余元。此外，法院还根据刚实施不久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受害人的具体情况，确认了1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原告当时要求的索赔数额为759万元，被告提出，这个数额缺乏法律依据，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为每人80万元，而被告的索赔额高出近10倍。而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是1992年制定的，基本依据是

《民法通则》，但从1992年到1999年，我国的物价指数发生了重大变化，医疗费用大幅度增加。更为关键的是，此规定与1993年实施的我国《海商法》的相关条款相抵触，并不适用本案。《海商法》接轨相关的国际法律，规定海事赔偿标准应与船舶吨位相联系，“春天商人”号轮总吨位达7624吨，人身损害的最高赔偿额可达312.27万SDR（当时，1SDR约等于1.4美元），按照这一标准，海事法院最后确定的赔偿金额为368万元人民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郭先江表示，这一人身赔偿案的判决，充分显示了我国法院在涉外审判中，独立引用我国法律，保护我国公民合法利益的司法权威。



工作人员正在对船小区内的大树进行修剪。（杨拥 董娜 摄）

## 既要绿化景观，又要采光通风 江东集中修剪社区大树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包静琴）昨日，江东区域城管局组织工作人员对船小区的大树进行集中修剪，此次修剪共涉及百丈、白鹤、东胜、明楼等4个街道31个小区。

“大树修剪涉及辖区所有住宅小区。无物业小区和准物业小区，我们会直接派作业单位进行修剪。有物业

的小区，我们主要是加强监管和技术指导。”江东区域城管局园林相关负责人说，既要保证居民绿化景观，又要考虑采光通风，兼顾爱绿护绿与安全居住。

记者了解到，近期江东区域城管局园林中心配置了两辆小型登高车，专门用应对老旧小区道路狭窄处的大树修剪工

作。这款小型登高车升降能够让工人修剪到9米高的树枝，曲臂可以钻过2.2米的墙门，十分灵巧。

下一步，园林中心将配备更为先进的粉碎设备，可将修剪下来的树枝直接粉碎，除了便于运输外，粉碎后的树叶还有绿植养护、道路养护等用途。

## 村企共建洁美村庄



图为志愿者在村庄开展志愿活动。

（黄程 郭恒焯 摄）

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郭恒焯）北仑区霞浦街道村企结对“千人志愿者”助力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活动近日启动。启动仪式上，林德气体向霞浦街道捐赠30万元作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资金。

据介绍，与村社结对的企业，将认领卫生整治“包干区”“责任田”；各志愿团队按照报名情况，组建了15个农村环境卫生助力团，每个助力团由1支村志愿者队伍和2-3支企业职工、居民群众志愿者护卫队组成。